

闽南文化研究的多元思考

陈支平

(漳州师范学院,漳州 362300;厦门大学,福建 漳州 362300)

摘 要:近 20 余年来,区域文化史的研究受到了包括学界在内的社会上的广泛重视,取得了众多可喜的研究成果。然而地域文化的研究往往受到地域界限的限制,各自的地域内的文化研究,大多关心于本地域的文化特征及其变迁,而较少顾及到其他相邻地域文化的参照研究,这样就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各说各话的研究态势。因此,我们必须从换位思考的角度,进行文化多元性的思考,或许对于区域文化的研究,会展现出一些不同的观察视野。就闽南文化的研究而言,文化的北方来源思维定式、文化的二元结构,以及闽南文化的世界性这三大问题,应该作出更加深刻的重新思考。

关键词: 闽南文化;思维定式;二元结构;世界性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224(2013)01-0008-05

收稿日期: 2012-09-12

作者简介: 陈支平(1952—),男,厦门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 20 余年来,区域文化史的研究受到了包括学界在内的社会上的广泛重视。就华南地区的情景而言,闽文化、赣文化、粤文化受到各自地域的高度专注自不待言,即使是在各个省区的地域之内,各个小地域文化的研究,也都开展得如火如荼,方兴未艾。举福建省为例:其著者至少有所谓的闽都文化、兴化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等等。这些不同地域的文化研究都取得了众多可喜的研究成果。

然而必须看到,也许是因为地域文化的研究受到地域界限的限制,各自的地域内的文化研究,大多关心于本地域的文化特征及其变迁,而较少顾及到其他相邻地域文化的参照研究,这样就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各说各话,甚至自得其乐、坐井观天的研究态势。因此,假如我们从换位思考的角度,进行文化多元性的思考,或许对于区域文化的研究,会展现出一些不同的观察视野。下面,我试就闽南文化的研究作三个不同视野的重新思考。

一、中国南方文化史研究的思维定式

所谓“思维定式”,换句话也可以说是人们对于自身所处的文化氛围的认同感和认知感。这种对于自身所处的文化氛围的认同感和认知感往往是以生俱来和水乳交融的。但是也正是这 2000 年来中国华夏文化的深入人心,她也就促使人们对于自身所处的地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形成了一系列的思维惯性,并且由此定格了一定的思维定式。这种思维惯性和思维定式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中国南方民族史和文化史的原有形态。

在另一方面,我们今天之所以有兴趣来研究区域文化史,大多是因为我们自己身处在自己熟悉乃至热爱的某一区域。事实也正是如此,当今研究各个区域文化史的学者,绝大部分是出生于这一区域或者是与这一区域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们。这就造成区域文化史的研究在不知不觉之中产生了感情上的某种依托与投入。学术研究上的感情投入,同样会使得这一学术研究蒙上许多理想主义的色彩。

在以上两种因素的影响下,区域文化的学术研究就很难真正走上客观审慎的正确道路。我们只要检讨回顾一下这些年来南方区域文化史以及福建省内各小区域文化史的研究结论,就不难发现其中所存在的弊病。举如下两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为例。

在当今的闽台民间社会,人们在谈论自己家族的演变历史时,大都认同祖先源自于中原地区,特别是中原的光州固始县一带。光州固始成了闽台民间社会的一个家族溯源的永久性记号。岂止闽台,在华南的珠江三角洲一带,以及散布于南中国各地的“客家”民系,也都有其各自的家族从北方中原溯源的永久性记号,譬如珠玑巷、石壁村、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河洛等等。现在东南地区的一些家族史研究,对于族谱资料的执着,不少人几乎到了迷信的地步。人们根据自家族谱的记载,可以非常自豪地对外声称自己的家族是中国最纯正的中原汉民族世家望族的嫡传血统。我们现在有些区域文化史的研究学者,往往把当地家族变迁史的这一历程,作为本区域文化有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主要表征之一。那么我们不能不说这样的学术认知不免有些坐井观天,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再如关于中国南方地区方言的研究,以往的思维惯性模式是现存的南方方言,是北方中原正统语言的传承。绝大多数的研究者们几乎都是从现在的东南方言是从北方移植过来的这一前提作为出发点来研究这一问题的。其结果是不论是那种方言,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全部是:我们的方言保存了最丰富的上古、中古时期中原的古音;中原古音在中原已经逐渐消失,我们的方言是中原古音的活化石,诸如此类。研究结论上的雷同,本身就失去了学术上的创新意义。北方中原语言作为当时政治核心的语言,对于南方新开发区域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原先流传在南方各地的地方语言,是否也在现在的东南方言中被部分地传承了下来?

出现类似于以上观点雷同、一厢情愿研究结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深受文化思维定式和文化情感投入两种因素的干扰。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认识和理解这一文化思维定式在中国南方文化史研究中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力呢?

中国上古时期的南方地区,是众多少数民族散居的区域。而在其北方地区,则是社会经济与文化均呈现出先进的所谓“华夏文明”。先进的“华夏文明”对于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是不可阻挡的。然而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的有关华夏文明及中国古代史的传统阐述,从总体上看,是以北方中原地区的历史发展为主要阐述脉络的,甚至可以表达为一种“北方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长期以来,我们及学界的大部分研究者一样,相信传统文献中有关南方社会、经济、文化乃至环境等方面的记载,藉以研究问题。但是在北宋中期以前,有关南方地区历史的记载,可以说主要出自北方士人或持华夏正统观念的南方士人之手,他们对南方地区的描述,主要是基于华夏正统观念以及中原士人观念的。

在这种“中原中心论”文化观念的支配下,宋以来,中国南方的士子及知识分子们在继承和补强中国正统的伦理文化规范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朱熹为代表的南方理学家群体对于中国后世的文化贡献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我们在阅读早期南方士子们求道为学的著述时,不难从中看出他们津津乐道于自己已经成为一名“正统文化者”的心态。而这种“正统文化者”,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演化成为一名亦步亦趋的北方文化中心标识的追随者。

“中原中心论”的文化影响力并不仅仅局限在南方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层面,它对于中国南方民间社会的演变以及民族关系的调适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刻影响。研究中国家族史的学者都注意到宋明以来中国的家族制度及其组织,南方地区普遍发达于北方地区。朱熹在重构宋以来中国家族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显然,如果说早先的中国南方民族历史文化是由北方中原人基于“中原中心论”而塑造出来的,那么其文化的影响所及,到了宋代以至明清,乃至现在的许多南方汉民,在已经在其潜意识里根深蒂固地根植了自己是源于中原的文化认同。在这样的文化认同之下,“中原中心论”的南方家族史、民族史以及各种与此相关的历史文化命题,就由南方人自己创造出来了,而再也无需由北方中原人代劳了。

这种源于“中原中心论”的文化思维定式,渗透到中国南方社会史、民族史研究的各个主要的层面,包括语言、风俗、艺术、文学、宗教的许多领域,甚至于近年来刚刚兴起的民族基因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先入为主的思维惯性的影响。这种思维惯性一方面体现了不同民族间文化相互影响力扩展的必然趋势,而再另一方面,它也必然给中国南方民族的研究蒙上重重的文化迷雾,从而导致了中国南方民族史、文化史研究过程中的历史与现实的偏离。

二、闽南文化的二元结构

我们对于以往中国南方文化史研究中的思维定式作了简要回顾之后,就不难理解闽南文化史以及其他小地域文化史研究过程中的观点雷同与一厢情愿的思考方式的普遍流行。同时,我们也就可以从这一前提出发,对于闽南文化的历史地位及其基本特征做一新的探索。

闽南区域文化乃至福建区域文化的形成,受到中原华夏文明的深刻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历史事实。闽南区域文化特征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秦汉以前,闽中土著居民与中原的交往不多,社会结构及文化民俗自成体系。汉晋至五代,中原汉人开始不断向东南沿海迁徙。随着汉人大批入闽,汉文化在闽中由北向南迅速传播,汉族文化逐渐取代土著民俗而占主导地位。宋代是福建社会经济得以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闽南区域文化特征的形成和演化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条件下,福建社会经济在短时间内跻身于全国发达地区行列。特别是宋代闽学的兴起,对于包括闽南文化在内的福建文化以及民间的习俗风尚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经过唐宋时代的锤炼,作为一种具有某些独特性格的闽南区域文化已经基本形成。元明时期,闽南区域经历了海洋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强烈冲击。明代中期以后,中国商品市场经济繁荣,士农工商的界限渐趋模糊,传统的农业经济更加掺杂混合了多元的经济成分。与此同时,思想文化界酝酿着求新求变的思潮冲动,更是对于闽南区域文化特征的走向成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闽南文化的形成与成熟定型虽然是伴随着中原文化在福建的传播而向前发展的,中华主流文化对于闽南区域文化的形成与成熟定型有着主导性的影响力。中原华夏主流文化由北向南而向各个边陲地带传播的历史,造就了人们认知地域文化的思维惯性与定式,即边陲等晚开发区域的文化是由中原华夏主流文化移植传承而成的。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原华夏主流文化南传得同时,原来生长于福建以及闽南区域的土著文化、外来的海洋文化等不同源流的文化,对于闽南区域文化的最终形成,同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由于受到文化思维惯性及其定式的限制,这种土著文化、海洋文化的合力在以往的研究中被有意无意地低估了。人们过多地关注于北方中原土民对于南方区域开发的压倒性作用,中国南方原有土著对于南方区域的开发与贡献被大大忽视了。事实上,所谓核心与边陲的文化概念是相对性的,在中国大一统国家的边陲地带,各自所处的自然地理位置差异很大,文化渊源的多样化,因此各个边陲地带接受中原主流文化的程度以及其所形成的地域文化特征也将是各自不同、多姿多彩的。

在这样有所差异而充满多元因素的历史变迁中,闽南区域文化就显现出一些与中原主流文化不同的独特表现形式。在文化思想方面,科举制度的羁绊及官僚体制的束缚,固然促使许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随波逐流,成为政治文化的殉葬品,但是也有一部分富有社会文化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其摒弃因循守旧、追求革新变化的思潮往往能够比中原地区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更能先声夺人;在社会行为方面,不尚空谈高调,脚踏实地,务实做事,努力进取,是民众的基本价值取向;追求效益,商品意识较强,对外来文化和民俗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这种情况又与中原内地人民的淳朴、守成和不轻易冒险的保守性格形成了一定的反差。

闽南区域文化作为中华核心与边陲的文化变异的一种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大大补强了中华整体文化的多样性。而在其自身的结构上,她能够较好地吸收中华核心文化以及其他区域文化,甚至外来文化的精华成分,来强化自身的文化特征。这种潜移默化式的、带有一定文化变异意味的区域文化变迁历程,是闽南区域文化得以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适应新的时代需求的最本质的力量源泉。

透过对于闽南区域文化历史变迁及其基本特征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对于闽南区域文化的本质作出这样的总结:闽南区域文化是一种二元结构的文化结合体。这种二元文化结合体既向往追寻中华的核心主流文化,又在某种程度上顽固地保持边陲文化的变身体态;既遵循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文化体制并积极为之作出贡献的同时,又不时地超越传统与现实的规范与约束;既有步人之后的自卑心理,又有强烈的自我表现和自我欣赏的意识;既力图在边陲区域传承和固守中华文化早期的核心价值观念,却又在潜移默化之中造就了诸如乡族组织、帮派仁义式的社会结构。这种二元结构的文化结合体,可以把许多看似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人文因素,有机地磨合和交错在一起。也许正是这种二元文化结合体,在

一定程度上滋生了闽南区域文化及其社会经济的持续生命力,从而使得闽南社会及其文化影响区域能够在坚守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同时,有所发扬,有所开拓。我们通过对于闽南二元结构文化结合体的研究,应该有助于对于中华文化演化史的宏观审视。

三、闽南区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途径

研究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史的学者,更多地把这种文化传播局限在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带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政治文化之上。事实上,仅仅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文化是远远不能涵盖明代文化对外传播的固有面貌的。我以为,明代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至少还应该包含一般民众的生活方式的对外传播。

明代是中国传统朝贡贸易向民间私人海上贸易变迁的重要转折时期。16世纪初叶,西方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相继东航,他们各以满刺加、吕宋为根据地,逐渐伸张势力于中国的沿海。这些欧洲人的东来,刺激了东南沿海地区商人特别是闽南人的海上贸易活动。伴随着明代中期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东南沿海地区商人特别是闽南人也开始萌动着突破传统经济格局和官方朝贡贸易的限制,犯禁走出国门,投身到海上贸易的浪潮之中。于是从明代中叶以降,东南沿海地区商人特别是闽南人的足迹几乎遍及东南亚各国,其中尤以日本、吕宋、暹罗、满刺加等地为当时转口贸易的重要据点。由于当时的欧洲商人已经染指于东南亚各国及我国沿海地区,因此,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活动,实际上也是一场东西方争夺东南亚贸易权的竞争。中国的沿海商人,以积极进取应对的姿态,扩展势力于海外各地。

明代中后期不仅是中国的商人们积极进取应对“东西方碰撞交融”的时期,而且还随着这种碰撞交融的深化,闽南地区的对外移民也形成了一种常态的趋向。这种带有家族、乡族连带关系的海外移民,必然促使他们在海外新的聚居地,较多地保留着祖家的生活方式。于是,家族聚居、乡族聚居的延续,民间宗教信仰的传承,风尚习俗与方言的保存,文化教育与艺能娱乐偏好的追求,都随着一代又一代移民的言传身教,艰难存继,而得到了顽强的生命力。这种由民间传播于海外的一般民众生活方式,逐渐在海外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象征。因此,我们在回顾中国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文化在明代后期向西方传播的同时,绝不能忽视明代中后期以来一般民众生活方式对外传播的文化作用及其历史意义。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表述:明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具有两个层面与两种途径,即由西方传教士及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翻译介绍到欧洲的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文化,以及由沿海商民特别是闽南人迁移海外所传播过去的一般民众生活方式的基层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界文明格局的变化,这两种文化传播层面与途径,并没有殊途同归,形成合力,而是经历了不同的艰辛挣扎的发展历程。

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文化对外传播,经历了明清易代之后,其开放的局面,还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然而到了清代中期,政府采取了较为保守封闭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于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逐渐采取压制的态势。在这种保守封闭的政策之下,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受到了一定的阻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革命的不断胜利和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欧洲中心论”的文化思维已经在西方社会牢固树立。欧洲一般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也逐渐失去了对于中华文化的那种平等的敬畏之心,延至近代,虽然说仍然有一小部分中外学人继续从事着中国文化经典的对外翻译介绍工作,但是在绝大部分西方人士的眼里,所谓的中华文化,只能是落后民族的低等文化。尽管他们的先哲们,也许在不同的领域提及并且赞美过中国的儒家思想,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大概也没有多少人肯于承认他们的高度文明思想,跟远在东方的中国儒家文化有着什么样的瓜葛。时过境迁,从19世纪以后,中国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文化在世界文化整体格局中的影响力大大下降,其对外传播的作用日益衰微。

反观由沿海商民特别是闽南人迁移海外所传播过去的一般民众生活方式基层文化的这一途径,则相对的通畅一些。清代政府虽然采取了较为保守封闭的对外政策,但是对于海外贸易,一方面是相对宽容,另一方面也无法予以有效的禁止。在这种情景之下,沿海居民从事海外贸易和移民的活动一直被延续了下来。特别是在向海外移民方面,随着国际间交往的扩大和资本主义市场的网络化,其数量及所涉及的地域均比以往有所增长。到了近现代,中国东南沿海向外移民特别是闽南人的移民足迹,已经深入到亚洲之外的欧洲和美洲各地,甚至于非洲。

如前所述,中国沿海商民特别是闽南人向外移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能够在相当高的程度上保留和传承其在祖籍地的生活方式。于是,经过数百年来中华海外移民的艰难挣扎、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历史事实证明,东南沿海民间基层文化在传播中华文化的道路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而这一重要桥梁纽带的形成与发展,闽南人在这一历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而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我们今天探讨闽南文化的历史地位与基本特征,闽南文化的开放性、辐射性、世界性,无疑是中国其他大多数区域文化所难于比拟的。从地理概念上说,所谓闽南区域,指的是现在福建南部包括泉州、厦门、漳州所属的各个县市。然而从文化的角度说,闽南文化的概念远远超出了以上的区域。由于面临大海的自然特征与文化特征,使得闽南文化在长期的传承演变历程中,不断地向东南的海洋地带传播。不用说中国大陆的浙江温州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沿海,以及祖国的宝岛台湾,深深受到闽南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带有变异常型的闽南方言社会与乡族社会,即使是在东南亚地区以及海外的许多地区,闽南文化的影响所及,都是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因此,闽南文化既是地域性的,同时又带有一定的世界性的。这样的文化特征才是我们今天所值得自豪的本质精神,应当予以继承发扬。在当今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之下,深入探索闽南文化尤其显得深具意义。

(责任编辑 林振礼)

Pluralistic Thoughts on Minnan Cultural Studies

CHEN Zhi-ping

(Z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Fujian 363000, China; Xiamen University,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Within the recent two decades, the study on history of regional culture attract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has many great achievements. Because of regional limitation, the study on regional culture is to be defined that most researches emphasize o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local, and is less consider to the study of other adjacent regional culture, which does not show a research trend of cultural dialogue to a certain extent. So, the cultural study must base on thoughts on cultural diversity, which shows some different observation field to regional culture study. As to Minnan cultural studies, its three problems that thinking formulary of all culture from north China, cultural dual structure and Minnan culture's cosmopolitan must to be re-considered.

Key words: Minnan culture; thinking formulary; dual structure; cosmopolitan

(上接第 4 页)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 Idea

FANG Chuan-an

(School of Polit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Fujian 362000, China)

Abstract: The core value is "core soft-power" in all soft-power of one country and nation.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idea is described in the CCP eighteenth report, which appears first in our Party's files. The important exposition not only is maj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hat our Party bases on building socialistic core value system, but also is the latest understanding that our Party's thinking about socialist core value idea problem. The CCP eighteenth report points out clearly that we deeply develop the various learning and teaching activity about socialistic core value system, and then lead social thoughts & condense social consensus by it.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t core value idea has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socialism; core value idea; connotation; significance